

# 教學相長，寒窗四載

## ——誌改行·轉業·攻學位的苦樂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十年海外外交官生涯告一段落，正捫擋就緒，訂好了飛機票，準備於十日內回臺覆命。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邂逅當時休士頓大學的政治系主任駱機博士 (Dr. Joseph Noguee)，我和他因為參加該校國際學生活動而認識，後來承他邀請對其班上學生分析遠東局勢多次，頗為相契。告以即將返臺，渠乃約定次日中午為我便餐餞行。吃喝間，他說：「你有興趣教書嗎？」

## 素知教師生活清苦

我一生曾有過許多志願，幼年嚮往自然，想作農夫；後來國家多難，想作軍人；戰後為發展農村，想學農業；內亂使我憧憬於政治的修明安定，為國家復興的基礎，激發我從政的興趣而考入臺大政治系。嗣以受同學的敦促，參加高等外交官考試及格而入外交部，在位十餘年。但從來沒有作教師的志願。

雖然我對安貧樂道，為人師表的人從小便有崇高的敬慕，這種敬慕的心情，除了因為自己知識的成長來自師恩而懷感激之心外，家父終生以教育為職業，而我從小學到初中畢業都是追隨在他的左右求學也是

原因。記得家父在當時頗具聲譽的湖南信義中學和龍洲師範學校教國文時，共教兩班，每班三、四十人，除了每天每班上課一堂外，每週學生有作文一篇，都是要教師親自批改。我因曾與父親同住，在當時被認為設備很好的信義中學教師宿舍，親見教師的清苦生涯，而視之為長途。除了平時必須勤學不倦，準備講義題材外，每星期一下午作文課後，校工抱着近百本作文簿塞進父親書室的書架上。以後的時間，只見父親整日伏案閱卷，直到下一次的作文到來。

當年國文老師批改作業的認真態度也是可佩的，不但字字推敲，句句斟酌，有時還把學生叫到室內親聆講解。遇到一篇好的文章，常一閱再閱，如獲至寶，並在文末題字品評。

當年湖南中學、大學的國文教師，大都能詩能文，而字跡也很美麗，每逢學校舉行成績展覽會，作文簿上老師的評語和字跡，都是最引人注意和欣賞的項目。父親的詩文、行書和草書，都曾為吾邑學人所推崇。

由於親眼看到作教師的辛苦，加上當時流行著一些俗話，如：「百無一用是書生。」「秀才遇了兵，有理講不清。」等等。幼小的心中，也許是由於權勢觀念作祟，對作一個教師和讀書人是不大熱中的，認為倒不如作一個農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善鄰親仁，與世無爭來得好過。那自己耕耘，自己收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本真和踏實生活，也很符合我的個性。可惜後來因為時局的發展，國難當頭，投筆從戎，離鄉背井，這一原始的理想，因而沒有實現。

## 仍然接下浸大聘約

言歸正題，當駱機博士提出教書這回事時，心中立即產生一種無名的情緒。我連在美國大學正式選課作學生的經驗都沒有，如何去教美國的大學生呢？我認爲他也許認錯了我的學術背景，或在開玩笑。「你爲何向我提及教書的事呢？你認爲我能到你的學校教書嗎？……」駱機說：「依你過去在我班上分析遠東問題的表現，和學生的反應看來，我想你能作一個很好的教師。你不是有碩士學位嗎？加上你十年外交官的經驗，教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等課目，資格是很響亮的。」駱機慢條斯理的邊吃邊繼續說：「我不是要聘你到我的學校教書，現在再過兩個星期便要開學了，我們通常是在五月底便聘妥了下學年的教授，而是創辦不到十年，聲譽鵲起的浸信教會大學一位教授臨時另有高就，他們託我推薦一個能教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政治學教授，我認爲你很合適，如有興趣，我便推介。」於是當天下午，我便去見了浸信大學的負責人。由於我學術背景的平凡，教務長史密斯博士對我教學的能力有點懷疑。但因駱機博士的推介，他也不便貿然拒絕考慮。於是約好第二天上午，由我試向該校暑期班政治科的學生講一堂比較民主與極權政治執善執惡的課，以憑定奪。當夜惡補一番，材料很容易地便組織起來，加上面對羣衆的經驗和勇氣，第二天，我幾乎是滿懷信心去應付這個場面。

三十幾個學生，加上教務長史密斯博士、院長康爲治博士，和一位不知名的教授，我把準備好的材料

講完，一個小時已快過去，剩下的時間讓學生發問。我也對答如流，頭頭是道。下課後，隨即同去校長辛頓博士的辦公室，教務長報告滿意後，校長說：「我喜歡孔夫子，希望你替我們帶來一些孔子哲學！」並當場決定予以聘用，康為治博士拍着我的肩膀說：「你在教學上有很大的前途。」

收到校長正式聘書是八月廿二日，距離開學的日子還有十天。課程早已排出，我將要教的課共四門：「美國政治思想」、「美國外交政策」、「美國政黨政治」、「國際關係」。除了「思想」一科較難應付外，其他三門都不大生疏。

按照美國學界情形，一個初獲博士的新進大學教師，如果要想把書教好，通常是一小時的課，需要作四個小時的準備工作。我一下子接下四門，既無教學經驗，又無選課經驗，真是如辛頓校長在聘書上所說的：「這個職務對你是一個挑戰。」

## 只好辭去外交工作

我接受了這個挑戰，但對外交部的「科長」職務也得有個交代，於是便以電報報告此事，並請辭職。外交部人浮於事，像我這樣一個平平凡凡，沒有什麼特殊才能，有時且格格不入的人，實在是有一個不多，無一個更好。因為，少我一個，不但可以空出一個位置讓新人填補，促進人事的新陳代謝，而且也可替國家節省許多開支。加上我一生重視道義的責任和錢財的清白，離職之後，對國家的貢獻，絕不會少於在

職之時。辭職報告獲批准後，我隨即將所有已經具領的全家四口（現已五口）旅雜各費數千美元，分毫不留的奉還外交部轉繳國庫。按照慣例，海外辭職或退休人員，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如此不苟地如數退還的，筆者在大使館服務時，便曾親自承辦過許多分毫不退的案件，外交部亦無從查究。筆者當時兩袖清風，並不需要那幾千元，也不是不知道外交部可予容忍，但我要求一個「清白」，清清白白地來，清清白白地去。多了那幾千元美金不會使我發財，少了也不會使我餓飯。後來大使館收到外交部批准離職還款的公文以後，大使先生還有一封公函，對我的奉公守法，清白自持表示嘉許。我認為那紙公文的價值，勝過幾千美元。後來我為國家利益吶喊的一些書函短文在紐約時報、箴言報發表後，也曾獲得大使的謝函，讚揚我為國奮鬥的初衷未變。

應聘浸信大學這個挑釁不是僅憑勇氣可以應付的，我每天苦讀準備講義到凌晨一、二點。兩星期內一下子要教不同的四門功課，要應付樂於發問題的美國學生，開始時，我真有臨淵履薄的心情。政治學不像自然科學，你可以悶聲不響地在黑板上解方程式、解習題、畫圖、作表，而是要講述、要分析，甚至要辯論。學說繁多，理論各異，你不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對你講述的題材必須有徹底的瞭解，而且要能運用自如，印證現實，才可能贏得學生的佩服。否則，學生一問，你瞠目不知所答，便馬上會傳遍全校，不待解聘，自己也無面見江東父老，只得捲舖蓋了。若厚着臉皮爲了吃飯而尸位素餐，或唾面自乾，那是沒有意思的，也是不可能的。執教開始後，最頭痛的經驗是：前一天晚上

焚膏繼晷準備好講一堂課的材料，不到一刻鐘便講完了。那時，「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句話所表達的情緒，特別尖銳。「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感覺也時常刺激着我的情懷。但不向困難低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少年壯氣，依然旺盛。加上過去遊宦期間，閱讀廣泛，常識豐富，在課堂上每遇青黃不接之事，即能隨機應變，把話題轉移到一個與主題有關的常識或時事問題上，稍加分析發揮，半個小時便過去了。

## 獨坐寒窗力搏挑釁

浸信大學當時雖創校不過十年，因係受勢力堅強和資本雄厚的美國南方浸信教會團體的支持和指導，董事會和學校行政當局都是很富有理想的保守派人物，希望把學校辦得與眾不同，尤其注重人格教育。因之，對師資的要求十分嚴格，不但品行必須絕對端正，稍有違背教規道德的行爲，即予解聘，十餘年來，已屢見不鮮。同時對教授學術水準和學位的要求，也很重視。目前數百教授中，有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九十三，較其他有名的州立大學比例還高。我的被聘，顯然是一種巧合。他們急着要人，而我可以充數，當他們能找到條件和本領比我好的人，我隨時都可能被黜。難怪當時曾有一位多年同事的某總領事和他的夫人到處爲我就心地說：「曹兄最多能教一個學期，曹兄如何如何……」等等。聞者頗不以爲然，渠猶不察，終於傳到我的耳朵，我也懶得生氣，置之一笑而已。如今時過境遷，事實證明他們那些假設和願望，

都是想當然耳的一廂情願的「好意」。

在一個學期快完畢時，一天，教務長史密斯博士到我的辦公室說：「我和康爲治博士都很驚異和愉快地發現，你半路出家，竟能如此迅速地走上軌道，而贏得學生普遍的歡迎……」他的話說起來好像是喝蛋湯一樣的容易，豈知每天深夜，當萬籟無聲，人們都在甜蜜的酣睡中休息時，一個接受命運挑戰的東方人，還在獨坐寒窗，一燈如豆，與霍布士、洛克、盧梭、孟德斯鳩、漢彌爾頓、傑佛遜、湯瑪斯佩英、山姆亞當斯、耶約翰、丹尼爾偉布士托、亨利克雷、約翰馬歇爾他們爲伍，被他們的高論雄辯，灌得頭昏腦脹，爲明日的課堂之戰而莊敬自強呢！

這番努力是沒有白費的，真是教學相長。爲了準備講義，我得到機會彌補了求學時期的疏忽，認識我的臺大和政大同學，都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有濃厚學術興趣的人（現在仍舊不是），而且，由於國勢凋蟻，國難未已，在讀書不忘救國的衝動下，我花費了很多時間在課外救國活動上。在臺大期間，我與李厚白兄等手創曾經轟動一時的「長風社」，當前臺灣名教授傅宗懋、華力進、愈寬賜諸兄，都是當年品學兼優，富有理想的親密戰友。臺大三年級時，我繼高班同學李文中、張豫生兄等之後，出任中國大專及社會青年聯合會全國總會總幹事，在今總統蔣先生指導，和李煥、姚舜諸先生的輔導和協助下從事青年救國活動。一九五三年，我由教育部考選，代表全國大專學生出席聯合國文教組織世界青年領袖講習會。由以上的這些活動看來，很容易地可以發現，我花在課外活動的時間是相當可觀的。因我沒有任何不良嗜好，既不抽

烟，也不喝酒，雖我的酒量很大。生活甘於淡泊，除了活動以外，便是閉門讀書。在青年軍有一位連隊長曾以「動如猛虎，靜如處子」期勉大家，這句話常使我不勝嚮往。所以儘管我爲課外活動花去不少時間，但閉門讀起書來，心無雜念，吸收甚快，所以學業上也能跟得上。

## 負笈北上苦攻博士

美國是一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社會，儘管我把課業應付得差強人意，學校當局却並不以此爲滿足，第二學期開始，校長、教務長一見面便提醒我，如果要想在美國高等學府安身立足，「博士」學位是必須的。言下之意，便是你如果不準備攻讀博士，不妨趁早另作打算。但我還是把他們的話當成耳邊風，自以爲既然教得不錯，何必自苦再去作老學生呢！何況我半路出家，「美人遲暮」，野心早已泯滅。一天，院長康爲治博士到辦公室問長問短，最後說：「辛頓和史密斯都很關心你的前途，問你是否決定進修博士。……」這對一個輟學十餘年後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一種精神上的威脅。因爲，傳統上，中國人學業告一段落，尤其快到四十歲的人，是很少再爲學位復學的。我於是回答：「我已快四十歲了，你看我還應該去修博士嗎？」康爲治說：「啊喲！你才快四十歲便覺得去修博士太老了嗎？告訴你，我五十四歲才拿到博士呢！我還要享受二十年博士頭銜的尊榮啊！」康爲治那時已六十二歲，童顏鶴髮，和善誠懇，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拿到博士學位執教以前，曾當過律師、監獄長等。他對我多年的關切鼓勵，情同兄叔



，令人銘感。他那句「我五十四歲才拿博士」的話感動了我。因我還不到四十，依他的計算方式，如果我拿到博士，我不是還可以享受三十多年嗎？

就這樣，我內心已決定去攻讀那誘人的「學位」了。康爲治把這消息告知辛頓、史密斯後，他們又關切到我家庭的生活問題，於是替我向南方浸信會教育基金申請到一筆錢，資助我完成學位，求學期間，並允許我繼續以全薪執教，利用暑假進修。如此，既可進修學位，又不影響正常收入，還有理由不去革「命」奮鬥嗎？

我本來是可以在休士頓大學就近註冊的，但由於下面幾個原因，終於使我不得不長征華府，負笈去美利堅大學。首先是受美國傳統的影響；南北戰爭以來，雖然南北互相輕視對立的情形已見改善，但北方在工商、教育方面的水準，一貫被公認是高於南方的。南方民情比較純樸、保守，具有農村社會傳統，但有種族歧視和排外的情愫。康爲治建議我去北方的大學，他自己爲紐約人，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他說，雖然現在南北地域觀念已淡，南方學術水準也已迎頭趕上，不輸北方多少，但社會上，學術界似乎仍受傳統影響，有貶抑南方之嫌。你拿一個休士頓大學博士，向北走，過了喬治亞州便少有學校要你教書，假如你有一個北方大學，尤其是著名的北方大學學位，不但南方大學搶著要，在北方也有地位。他這番話的真實性如何，我未加考證，却加強了我去北方的心願。到那個學校去呢？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都只承認我政大碩士三分之一的學分，學費又貴。而華府美利堅大學在學術地位上，雖然不如上述各校，但承認我

三分之二的碩士學分。加上我服務大使館時，爲了職業上的需要，曾在該校夜班旁聽過二門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課。當時雖不是爲了學分，但紀錄有案，也承學校照算六個學分。而該校國際關係研究院，因與國務院、新聞總署和國防部有合作計劃，又係國會立法設校，關係密切，以及多任總統的親臨破土，剪綵和演說（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三年有名的核子禁爆演說，即在該校發表），享譽甚高。尤其在該校「理論與實用」並重的教育宗旨下，不但在美國，而且在世界都很有名氣，爲美國國際學生最多的大學之一。

最重要促使我去美大的原因，本不足爲外人道，那就是：其他各校不但都要我多修學分，以補碩士學位之所需，而且要按照新研究法的規定，必修統計、資料分析等數字意味很濃的課。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從小就害怕數字，一直提不起興趣。考臺大時，數學僅得十二分，而且很可能是閱卷教授筆下留情，不忍心予我鴨蛋的菩薩心腸所致，使我得以英文八十一分，國文八十二分加倍計算後，才勉強符合第三規格錄取進入臺大。現在要我再修統計學、微積分這類課目，我簡直連註冊的勇氣都沒有了。美大從一九六六年起也有同樣規定和要求，但因我曾於一九六五年在該校旁聽，依據「法律不究既往」的原則，校方把我算作一九六五年註冊的學生，可以不受新法規定，而免除我補修統計學這一類令我頭痛的課。真不啻是一種特赦。

還有一件令我感激的方便事，是美大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親自批准我不受住校一年規定的約束。我提出我在浸信大學教授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等課程的證據，告以教學相長，比住校僅學來得收穫要大。他同

意了我的觀點，而予我繼續受聘浸信大學全薪執教，使我家庭經濟沒有發生恐慌。一面提出研究報告，收集論文資料；一面準備講義，照常上課，而僅須於暑假去華府選課補足學分的要求。就這樣，我努力了五個暑假，終於完成了一個國際政治和比較政府的哲學博士。這期間所經歷的艱辛、喜樂，不是一篇短文所能道盡的，留待退休以後去回憶吧！

### 一個感人慶賀茶會

當論文通過，獲得學位，凱旋榮歸之後，浸信大學的教授同仁，特別爲我舉行了一個感人的慶賀茶會，我有一些騰雲駕霧的感覺。

回想唸小學時，不知是在一本什麼書上讀到一句現在並不認爲是真理，但對我常具影響力的格言：「生命是一場不停的戰鬥，不是帶着光榮而生存，便是帶着滿身創傷而死去！」不生不死，渾渾噩噩，吃飯睡覺的人生是乏味的。在這個茶會上我真實地體味到光榮人生的意義。並不是那「學位」有什麼了不起的意義，「博士」到處都有，而且並不怎麼值錢，連高中沒有畢業的卡車司機、泥水匠甚至侍應生都比博士教授賺的錢多。但我的「學位」似乎代表着一點行健自強的成果，和高尚人生的象徵。甚至比那些拿國家公費、政府津貼或父母財富，在安適順利環境中拿到學位的朋友，實質上也有不同的意義。我爲此感到驕傲、滿足和光榮。

## 飲水思源感恩良多

當然，在這一瞬間，飲水思源，我會想到所有曾在我生命中對我有過鼓勵、幫助、關切和愛護的人。祖父母、父母和大姑母景霞對我幼年掬育之恩；初中畢業從軍後，青年遠征軍二〇五師師長劉樹勛將軍夫婦對我的慧眼照顧和鼓勵，尤其是劉夫人黃修祖女士對我的特別眷愛，如同家人姑嬭，特別難忘，一言難盡。復員後就讀貴陽青年中學，孫樂陶校長和許多老師的待我如子弟，期我若嚴師，也對我影響深遠。家叔聖芬先生和嬸母熊文黛女士數十年來有如父母的期許和照顧，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慶失陷前夕，叔父隨節在渝，在軍書旁午，兵荒馬亂的情形下，百忙中爲我和長兄找到飛機，撤退來臺，才有以後的生命和成就，我無需用言語來表達我的感激。後來又據家叔見告，我能於緊要關頭隨同當時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司法院長居正先生的專機來臺，以及臺灣入境，都得力於鄉賢黃少谷先生的緊急協助。多年後少老出長外交部，我已外放華府，忝列僚末，少老出使西班牙任滿回國途中，來美檢查身體，在華府小住，得機親聆教誨，朝夕相見，略效微勞，以償宿願。以後多年，親友來美，少老夫婦猶念念不忘，不遺在遠，輒囑代達謝忱，其謙和念舊，有如此者。

初抵臺灣，又承家叔之介，服務國防部長辦公室，部長袁守謙先生不以我年幼無知，破格任用，予我承辦部長交際事務重任，得機歷練。不數月考取臺大，又蒙批准深造，並贈獎金、腳踏車等，以壯行色。

臺大求學期間，復被延聘爲袁府家庭教師，與其男女公子教學相長，歡愉數載。袁夫人陳續紛女士的親切招待，至今難忘。進外交部是當時美洲司司長許紹昌先生，根據高考及格外交人員名單和實習成績識拔。許紹昌先生精明能幹，中英文造詣俱佳，其辦事之認真負責，尤屬罕見。我初出茅廬，能在他的指導下學習，受益匪淺，實屬幸運，我於一九五八年金馬炮戰時能追隨他（公使）和葉公超大使外放華府，自然也是他的慧眼推薦。

在大使館服務七年半時間，由於制度限制，自覺沒有什麼貢獻。到蔣廷黻博士出任大使，因他學識淵博，早享盛名，於聯合國代表任內，又表現卓越，使我從小對他便有幾分崇拜。由於我負責編寫使館工作月報，和他面談的機會較多，彼此印象良好。特別是在一次工作會報中，當他談到美國如要襲擊中共原子核子設備，在國際法上的立場將是如何時，他想到歐洲歷史上，也是國際公法上的一件事實可資引用，但記不起那是怎麼回事了，於是問在場的十多位袞袞諸公，包括幾位公使、參事、一秘、三軍武官、高級顧問等等，竟無一人答得出來。大家啞口無言，瞠目相對，情形很是尷尬。碰巧我想起二次大戰期間，好像是一九四〇年，當法國被希特勒掃蕩投降後，一部份法國海軍殘餘艦艇逃到北非，停在地中海，英國怕它們落入希特勒之手，又不能收歸己有，於是派飛機把它們炸毀。當戴高樂的戰艦法國根據國際法向英國抗議，要求賠償時，英國以「自衛」爲理由加以拒絕，並引用一個也是以英國爲主角的歷史事實，但曾爲國際法學家公認的案件來搪塞。那案件在國際法上稱作「哥本哈根案件」，是一八〇七年英國爲了怕丹麥艦隊

淪於敵手，不顧中立條約對丹麥的保障，偷偷地派強大海軍予以攔取，也是爲了「自衛」，而後來爲國際法所承認。我想蔣大使心中所想到的便是這件事，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學問，我碰巧記得而已。看到大家都很客氣，不願開口，而大使又一口接一口地猛吸雪茄，好像非要把那件事回想起來似的，於是我以作會議紀錄的資格說：「大使是不是指十九世紀初年，英國海軍爲了自衛攔取丹麥艦隊的事？」這一提，歷史學家出身的蔣博士便滔滔不絕地接下去了。他正視著我，表情顯然是愉快的。當天下午，他特別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面予嘉許，並熱情地說了許多鼓勵的話，我內心十分慚愧，因爲我不過是碰巧記得這麼回事，而大使顯然誤會我是一個好讀書、有學問的僚屬，我感到是自己在替自己找麻煩了，因爲我是經不起考驗的，我的頭腦是空虛的。

後來大使館參事兼秘書組負責人傅冠雄老先生逝世，傅先生是老外交家，爲顧維鈞大使多年的機要秘書，國學根底和道德、文章都很好，他去世後，外交部電告蔣大使，請他就現有館員中文程度較佳，辦事熱心者，指派一人接替傅老遺職，大使便要我濫竽充數。一直作到蔣氏離任，周書楷大使到後一個多月才解除我秘書組負責人的職責。與蔣廷黻博士同事三年多期間，公使江易生先生也是對我尊崇備至，相處愉快，他們每年都予我考績甲等，蔣廷黻博士且常常指定我閱讀一些書籍，並不時強調：「知識才是力量」，「惟知識才可救國……」信哉此語。由於上述這些情形，在一個人多嘴雜，良莠不齊的公務機關，嫉妬傾軋一類的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在大使館工作的最後一、二年中，也便看到和經歷不少這類現象。於

今想來，深覺好笑。因而，我常常感到：一個團體，不論是政府機關或工商企業，要求有成，必須發揮團隊精神，各盡所長，衆志成城，必所向無敵；欲發揮團隊精神，必須有健全的人事制度，賞罰嚴明，獎善去惡，汰弱留強。否則，便很容易造成坐以待「幣」，羣魔亂舞的局面。

## 君子之樂優美人生

在華府的最後一年中，又有機會與另一位爲人作事都爲我所欽佩的新任公使沈錡先生共事。他對我也極爲友善，而且有過照顧和幫助。一九六八年夏季，他在外交部政務次長任內，曾懇邀我回部替他幫忙作他的助理。當一切安排快要就緒的時候，他忽然奉派駐澳洲大使，這一淵源，因此中斷。以上這些人對我的照顧和幫助，不論多少，幾乎都是一種自然關係的發展，不是我所主動要求的。我不太習慣於開口求人，半生來也想不出曾經向任何人開口主動要求過任何事情，或作過非份之想，雖至親好友亦然。記得從青年遠征軍復員後，在貴陽青年中學求學時，曾意外地接到家叔自南京寄來的一點錢，囑加添衣物書籍，信上並謂：「吾侄刻苦自立，聞多年來從不啓齒向家人一索錢物，可敬可佩。但求學期間，如有需要，仍應隨時見告，不必太自委屈……」云云。情意拳拳，至今難忘。但後來我雖時常有經濟困難，或其他問題需要幫助，但還是不大願意開口。我常有着「人到無求品自高」的氣概。雖然我並不認爲那是什麼了不起的美德，而且瞭解那是很不時髦的處世態度。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衛怡賢女士，她對我的幫助和照顧自然是很大的。她不但替我養育了三個善良可愛的子女，而且勤勞儉樸，能內能外，時下實屬罕見。西洋有句俗話：「一個成功的人背後，常站着一個女人！」我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功，但她確是常站我的背後。

這篇文章已經像跑野馬似的扯得很長了，原只想把轉業奮鬥的過程作一紀錄，但在這一過程中有許多可感的人和事，不能不趁機加以提出，以誌懷念，並抒謝忱！至於執教十八年來，兩校受業學生，達萬餘人，沒有發生過一件不愉快，或尷尬的事。如今外出商場採購或閑逛，赴餐館小吃、赴劇院看戲、赴海濱玩樂、赴公共圖書館看書、赴醫院探病，都會碰上曾經被我誤過的蒼生，都會聽到「曹博士你好！」誠摯悅耳之聲。中國有「桃李遍天下」這句話，在我目前的小小天地裏，我確實有這種感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但是孟子所說的君子之樂，實在也是一種高尚優美的人生境界。欲加珍惜而圖繼續，敢不「莊敬自強，行健不息」，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嗎！（原載拙著自強集）